

中國人民從此覺醒起來了！

開國大典

一九四九
實錄



武國友★編著

紅旗出版社

开国大典

一九四九

实

录



武国友★编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9 开国大典实录 / 武国友编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51-1764-8

I. 1… II. 武… III. 革命—现代史—史料—1949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403 号

书 名: 1949 开国大典实录

编 著: 武国友

责任编辑: 刘玉成

特约编辑: 韩志利

责任校对: 李 娟

封面设计: 好書坊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 编: 100727

E - 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64037145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764-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迎接“一九四九” / 1

- 一、两篇主旨截异的“新年文告” / 1
- 二、“敲门使团”北上始末 / 7
- 三、“北平式的解放” / 16

第二章 山村里作出的“大抉择” / 25

- 一、一再被推迟的访苏计划 / 25
- 二、秘密的远方来客 / 28
- 三、明确提出“一边倒”方针 / 37
- 四、刘少奇秘访苏联 / 43

第三章 二十八年的最后岁月 / 51

- 一、西柏坡村定大政 / 51
- 二、大接管：穿行在新旧中国之间 / 62
- 三、“解放军下午一点钟进城！” / 76
- 四、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 84

第四章 “去”和“留”的彷徨与抉择 / 99

- 一、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后 / 99
- 二、两位大使的“去”“留”之谜 / 106
- 三、国事茫茫人彷徨 / 116
- 四、汇聚民主群星 / 125

第五章 香山“劳动大学” / 137

- 一、双清别墅的新主人 / 137
- 二、“天津讲话”始末 / 148
- 三、奔走在香山—中南海之间 / 156
- 四、在来青轩的日子里 / 163
- 五、缺席开国大典 / 166

2

第六章 怀仁堂里的盛会 / 171

- 一、新政协召开前夕 / 171
- 二、开基立业的盛典 / 182
- 三、“临时大法”的诞生 / 191

第七章 筹备开国的日日夜夜 / 203

- 一、开国的警备与布防 / 203
- 二、地球上的“新地标” / 221
- 三、大典的选址 / 228
- 四、毛泽东像挂上天安门 / 231
- 五、忙碌的“庆典工程” / 234

第八章 新国家标志酝酿内幕 / 239

- 一、国号确定经过 / 239
- 二、国旗的诞生 / 244
- 三、国徽图案的确定 / 254
- 四、徐悲鸿对国歌的重要建议 / 261
- 五、“十一”国庆的来历 / 266

第九章 开国大典 / 269

- 一、“聚首天安门广场” / 269
- 二、大典时分 / 273
- 三、“这次阅兵也是初战” / 278
- 四、飞过天安门 / 283
- 五、“人民万岁！” / 287

第十章 在 1949 年那个秋天 / 291

- 一、大江南北共此时 / 291
- 二、在世界的瞩目中 / 303
- 三、第一份“贺礼” / 312

本书资料的主要来源 / 319

第一章 迎接“一九四九”

一、两篇主旨截异的“新年文告”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共60多人。

虽然是新年的喜庆日子，到会的人们却难以掩饰内心的沉重，强作欢颜，互相寒暄，蒋介石一改往常全身戎装的做派，穿了一身灰哗叽长袍，像一个儒雅的老学究，他面上也挂着笑容。团拜仪式第一项是蒋介石致祝词。在团拜会上，蒋介石还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当天，《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

宣读这篇《新年文告》，蒋介石心中充满悲凉之感，不仅仅因为战局的惨败，而且也为他默默地起草了无数文稿的秘书陈布雷已离他而去！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陈方临时为他捉刀。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蒋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呼号，也是蒋介石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公开哀鸣。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据称有两个目标，一方面对共产党提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制定出蒋“总统”辞职后，副总统据以与共产党和谈的大纲。但人们在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已能清晰地看到蒋家王朝败亡的态势。

关心时势的人们在读了此《新年文告》后，无不大失所望。洋洋洒洒数千言，无半分和谈之诚意，唯见推脱内战责任之用心，但在当时也有少数革命同路

人被蒋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革命到底的信念不太坚定,对现实十分迷惘。

面对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心境则完全不一样。在瑞雪纷飞的西柏坡,忙得顾不上执笔的毛泽东,由他口授,由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最后由他改定,为新华社写出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在这篇献词的开头不容置疑地宣告道。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毛泽东豪迈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

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月6～8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49年内的任务。出席会议的人员比1948年九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

6日下午，毛泽东做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令人经久难忘。

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维兵团已被全歼，进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所以毛泽东说：平、津、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我前线可以增加100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今年一年的任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6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上打倒蒋介石更好。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经济上，如果上海还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地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今年加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要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做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会不会出兵？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才不会张皇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欧洲比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还是个问题。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保

护侨民是应当注意的。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者，我们必须做。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对不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教，外国学校、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等。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泽东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有的报纸，喜欢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抗战初期，就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土匪”。在8日的结论中，毛泽东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区别开来。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做些比较。过去30年，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毛泽东说：有利也有弊。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复地说。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泽东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二是不利。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南下是去打敌人，克服困难，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刘少奇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好的。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批工人干部。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大多数干部（当然不是全体）有进步。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土地改革有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

迟了。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任。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他们深知，单靠军事斗争的办法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妄图利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保存其残余势力，争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文告虽然歪曲历史真相，掩盖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责，但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提出关于和谈的五个条件。

为了回答南京国民政府的求和要求，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严厉批驳了文告提出的5项和谈条件。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这个声明给了蒋介石文告的假和平阴谋致命一击，使蒋在一个星期之后不得不“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和平条件，指出：“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民主同盟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中，认为中共八项和平主张，非常切合目前时局要求，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二、“敲门使团”北上始末

蒋介石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同时，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党派首领，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派人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争取他们的好感，想制造舆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以南进军，达至“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幻想着“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7

中共中央一直把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加以区别，此时更有意争取桂系反蒋。所以，也多方面表达了与桂系首脑接触的愿望。

1月20日，中央复电在香港的中共驻港工作人员潘汉年，请潘答复前来香港与中共商洽和谈的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在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白崇禧派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毛泽东批示：“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这份电报，是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出的。

1月22日，新华社将即将发表的《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

阁员》新闻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新闻稿做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新闻稿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而恰恰在 22 日这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五人和谈代表。同时，实际推动和谈展开，他还于同一天约见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他向黄、刘表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因此，要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从旁协助。

1 月 23 日，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示：国民党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叶剑英设宴招待他们，指出国民党挑起内战以及进攻解放区和三大战役以后的形势，并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

29 日上午，黄启汉（刘仲华暂留北平）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面见李宗仁，汇报了北平之行的详细内容。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并要黄启汉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在黄启汉还没有返回南京之前，1 月 27 日，李宗仁即致电毛泽东，言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以谈判中商讨决定。”随后，李宗仁为试探中共对谋和的反应，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名流，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

2 月 6 日至 11 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到北平。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蒋介石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将代表团送到六国饭店。晚上还设宴款待，叶剑英主持了宴会。代表们对此深感满意。

第二天，根据中共安排，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8 日，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邱致中等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

但是，代表团成员明显对共产党及其革命到底的决心缺乏了解。吴裕后等在谈话中提出：若和谈不成，国民党内开明分子愿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贵党用武力击败国民党，则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势必全部被毁，加重贵党建国之困难。而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蒋介石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我们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均未表态。

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强调：“代表们……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与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14日，李宗仁再次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接踵而至。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到上海，对上海贤达一一拜访，希望他们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协调人。

经过缜密筛选，几位在上海滩声望高、在国民政府中资历深的人士走进李宗仁的视野。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李宗仁决定让他出任代表团团长。

章士钊，清代秀才，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有声望的教育界人士。

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司法部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

银行家陈光甫，拥有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无数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

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共产党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列入代表团人选。

1月24日，李宗仁派代表刘仲华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光甫，刘仲华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29日是传统的春节，30日，李宗仁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光甫。31日，李宗仁亲自到上海，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20多位各界社会名流，说此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敲门使团”。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陈光甫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月6日，李宗仁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光甫，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宗仁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陈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陈光甫在后来的日记中提及决定不去的原因：还是主要出于为个人考虑，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想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实际上，他对陌生的共产党充满了恐惧，担忧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尽管经过李宗仁及其他人的一再劝说，陈光甫还是拒绝参加“上海人民代表团”，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李宗仁不得不放弃。

最初确定的凌宪初、欧元怀、侯德榜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愿前往。2月8日，李宗仁再次赶到上海。最终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前往。

李宗仁所以请邵力子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70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了所谓的“和平”重任。

2月13日上午4时，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的C-47型民航飞机载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前往北平。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外，随同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刘仲华，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胃，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明星、地下党员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科长顾乐树与技师雷仲仁等19人。当飞到青岛时，停下加油，才发现飞机的左翼坏了，如果不是为加油停下，一定会出危险。这时在青岛与北平方面联系时，中共才获悉除四位代表外，还有十余人。中